

我写过很多具有工业味道的小说,去年末出版的长篇小说《锦绣》的背景就是一座东北的工业城市、一家老牌大型国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工人登场了。这样的背景通常被称为“工业题材”。这类题材的小说,成功的范例不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就我自己而言,也存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套路的问题。把这类小小说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就容易遭遇一种尴尬处境。怎么打破套路,是工业题材创作的一个课题。打破传统、基于现实进行新的创造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锦绣》是我历时三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打破套路,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中,有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抵抗原来的思维定势,争取用新的文学呈现来表现工业,表现工人。这种抗争并不拒绝传统的浪漫主义,不消解激情,不解构崇高,相反,采用足够的浪漫与激情,使两代工人的形象由普通而崇高起来。这种崇高不是塑造假大空的人物,而是从还原人的本真一面出发,用普通人的情感,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和琐碎的工作细节,来塑造人间烟火中的形象,来描写只有劳动才有的壮美场景。努力从某些局限中走出,冷静节制地叙述波澜壮阔的工业进程,尽可能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幽微心理和复杂心理。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可以说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部小说分三卷,分别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后新中国的工厂故事。我的本意是追溯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早期的辉煌和新时代的振兴,全方位讲述中国企业人的工作和生活,对东北独特的工业文明作细节性挖掘,塑造新时代工人阶级的人物形象。张大河、张怀勇、张怀双是我着力塑造的人物,用他们来代表一代又一代的企业人。新形象就要有别于老形象,就要赋予人物以新的内涵。新的内涵是什么?当然不是概念,而是人,普通人,是带有所处时代烙印的人。把这些普通人塑造好了,小说就成功了一大半。普通人有的七情六欲,他们都有,可他们又是不同于普通人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以当面临两难选择时,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放弃自我。张大河这个人物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寓言性,他是一家大型国企和一座工业城市的人格化身,他的命运与工厂、城市的兴衰密切相关。而他的儿子们,既是他的继承者又是反叛者。时代在进步,世界在变化,他的儿子们显然比他更适应新的世界,儿子们身上也便有了很多新的品质。尽管大时代的洪流对小人物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但他们并非简单地服从,不是在历史的变迁中随波逐流,而是有勇气进行选择,进行探索,努力走向光明之路。在这样的人物流位中,一个个小说人物的遭遇也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连,他们经历波折和苦难,却承载着社会的正义。

给冰冷的钢铁注入温度,这是我在写作《锦绣》时解决套路化困惑的一种尝试。情感生活伴随着主要情节的发展而推进,而作品的主题与意义,作者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都不动声色地隐藏在叙事之中。工业叙事不要剥离日常生活及人自身的丰富性,让工业的气质和氛围沉浸其中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氛围中,体验的深度也就成了文本的深度,对工业的书写也就成了对人的书写。我们的工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之中有领导,有技术人员,有工匠,他们之间不是符号化的大同小异,不是模糊的阶层符号。他们一个个地矗立,以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的形式形成群体,以每一盏灯的形式组成万家灯火,照亮自己的内心,穿越人性的黑暗,形成伟大的工人集体。

用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改变工业元素的沉闷感,这又是我着力要实验的。写《锦绣》这部小说时,我很注重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以叙述、白描、日记、厂志、安全简报等方式来讲述一座工业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历史,讲述一群人的生活命运,并试图以众多小段的叠拼形成一幅工业城市的图景。例如,在第一卷中,我在章节与章节之间,插入了主人公张大河的日记,不规则地也插入几段厂志。在主体叙述中,我尽量冷静和节制,少用心理描写,多用白描,这样给读者的感觉会客观一些,想象的空间也会多一些。而插入的日记正好填补了心理描写的不足,主观与客观交替呈现,会产生一种波浪感的阅读体验。而插入的流水账般的厂志则增加了真实感。现实主义的小说的特点就是真实感,尽管是虚构,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真实感,并在阅读中信以为真,也算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在第二卷中,除了插入张怀勇日记以充分展示他的内心世界,还插入厂志和安全简报,使文本更加丰富、饱满。第三卷讲述新世纪后新一代工人阶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奋斗史。章节之间依然插入日记,只不过这一卷插入的不是一个人的日记,而是张大河、张怀勇、张怀双父子等多人的日记,使得插入的文本与主体叙事形成互补与对流,尽可能地揭开生活表象,书写人性和时代。

我有意在工业叙事中加入了“生活化”处理。即使再宏大的命题,也要从小处着手,往小住细说才是小说应该做的。工业叙事并不排斥庸常生活,对人物的庸常生活进行描述更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表达,在大场面的四周围满了小场面才是生活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和劳动场景相伴出现,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空间。而大事件的进程又因生活和劳动场景的挤入,变得张弛有度,削弱了工业与钢铁的冰冷,从而提升了小说的温度。这样就尽量让宏大的主题以暗河的形式存在,以雾气状显现。

充满钢铁气味的工厂“习性”更容易形成个性化审美经验,在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融汇过程中,也是具有现代性的。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工业题材的写作是有很大值得开拓的空间,这牵扯到作家怎么写的问题。如何将所谓的“工业题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审美实践中走向更为宽广、开阔的领地?我愿意身体力行,做一个实践者。

(作者系辽宁锦州市作协主席)

头顶“矿灯”掘进前行

□刘庆邦

环境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潮湿、黑暗、压抑、幽闭,又时刻面临着自然灾害对生命的威胁,的确有着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独特的心灵世界。我们的写作离不开现实,每个作者都有自己对现实的切入点。我对现实的切入点之一就是煤矿生活,煤矿的现实既是我个人心目中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层次上的现实。文学来自人民,我们的作品必定要书写人民。全国600多万矿工,1000多万矿工家属,无疑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他们称为矿工,也可以把他们说成是头戴矿灯的人民。这部分人民从事着人间最繁重、最艰苦的劳动,却支撑着国家的能源大厦。这部分人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胸怀高远,一心在为祖国的光明和强盛贡献着青春和力量。每每想起我的那些仍在地底日夜挥洒汗水的矿工兄弟,我的双眼就禁不住盈满了泪水,让我怎能不与他们贴心贴肺,怎能不深情为他们歌唱!

我多次说过,煤矿也是文学的富矿。是的,煤矿生活处处充满感情、象征、隐喻、哲理、诗意和艺术,比如下降与上升、黑暗与光明、固执与燃烧、冷峻与温暖、沉默与热情、时间与空间、牺牲与奉献、死亡与新生等等,可同样面对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有的作者却不知它富在哪里,这的确存在一个如何发现和挖掘文学富矿的问题。怎么说呢?还是打比方来说吧。比如矿井下很黑,黑得铁板一块,用炸药都炸不开。我们头顶一盏矿灯就好了,有矿灯照明,没有方向可以有方向,没有路可以有路。走到掘进窝头,尽管阻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黑着脸的、密不透风的煤壁,

我们奋勇前行,照样可以开掘出一条巷道来。矿灯被称为矿工的眼睛。说到这里朋友们就明白了,对文学富矿的发现和开掘,也需要“矿灯”的照耀和引领。只不过,这“矿灯”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而是精神和心灵意义上的。对于有志于写矿工生活的作者来说,不仅要采到煤,还要采到“火”。不管你采到多少煤,那些煤很可能是无效的。只有在采到煤的同时还采到了“火”,用“火”把煤点燃,煤才会熊熊燃烧,发光发热,发挥出应有的能量。“火”与“矿灯”的意思一样,都是思想性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基于这样的自觉认识,最近我又完成了中篇小说《花篮》和短篇小说《梧桐风》。前者以审美和反思相结合,主要写了“文革”对普通矿工的伤害。后者以诗意的意境写了矿工悲苦的爱情。中篇给了《十月》,短篇给了《北京文学》,都已得到他们的认可。

矿工的生活值得写,各行各业的生活都值得写。写矿工的生活是这样,写其他从业人员的的生活也是这样,都有一个怎样认识和怎样写的问题。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行业系统代表团集中了石油、铁路、煤矿、自然资源、电力、冶金、水利、石化、化工、公安、金融、科普等十个行业的60位优秀作家。作为行业代表团的团长,我多次与作家同行们一块儿讨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国作协的工作报告,大家群情振奋,发言踊跃,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行业,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

中国工业,还要写世界工业强国发展历程,还要写中国与工业强国之间对比以及各自国家成败经验。所以写作开始时,总是感觉有许多话要讲,任凭自己情感奔泻而下。那段时间,我每天很早很早就起床,简单洗漱之后,立刻坐在电脑前,面对屏幕,许多久远的个人往事与数百万字资料相互融合,如汪洋大海一样把我彻底淹没,我也有过三十万字,一下子写了六万字。尽管之前我也有过三十万字的写作经验,但这次还是让我备感惊慌,沉静下来才觉得内容过于庞杂。

于是几个月后又开始进行删减,才发现删掉的部分正是自己之前最得意的地方。为什么“得意之处”反而被删掉,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得意之处”常常是猛然切入进来的,是没有进行深入思考的、没有经过时间沉淀的内容。始终埋伏在心中的感觉,才是“久经考验”的岁月之情,它们在作家心中已经储存许久,早已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友情笃深的朋友,绝对不会让你一惊一乍,你太熟悉它们了,所以它们看上去不是特别惊艳,这才是去掉水分后的真正的素材。

但最大的问题还不止这些,而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难道仅仅是书写个人情感吗?表面上看一部作品的构思、书写,是作家自己的事,似乎与国家、与时代无关。但只要深究下去,一定是时代背景对作家思考的激活。2015年5月国家正式提出制造强国战略,第一步是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的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战略?纵观世界强国,没有不重视制造业的,因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制造业重要性的理解也在不断加强,制造业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公开的“隐秘的力量”。“三条石经验”不仅是天津的也是中国的,它是一枚工业教材的“活化石”,可以供我们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认真分析。因此所谓的“任何一次书写,都是恰好到来”,其实就是作家“小我”的思考,与时代“大我”的精神契合。

(作者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



任何一次书写,都是恰好到来

□武 歌

每篇作品的诞生,看似是作家心绪的自然流淌,其实都是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个交汇点上,“个人经历”与“社会现实”迫切而又真诚地相遇,是在时代大背景下的作家的感悟。比如我刚刚完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三条石》,这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是我最近几年最为艰难的一次创作跋涉。在创作这部作品的三年时间里,我多次陷入困境,从初稿到终稿,经过反复删减与增补,算下来有近十万字被舍弃,望着被搁置在电脑中的废弃文字,心疼得仿佛要流血。

“三条石”是天津一个地名,至今仍在使用,所有天津人特别是老年人没有不知道它的。这里曾是天津民族工业乃至华北地区机器制造业的出发点。1860年,一个来自直隶的农民在这里支起了第一个铁匠炉。很快,有了第一个打铁小作坊。鼎盛时期,这片狭窄的区域有数百家小企业,因此也闻名于世,被《大公报》称作“铁厂街”,打铁声昼夜响彻在京杭大运河在天津的重要节点——海河三岔口。从这里卖出的产品以及走出去的企业分号,曾经遍布华北、西北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后来随着历史风云变幻,“三条石”街名逐渐演变成天津民族工业的代名词,“三条石工人”成为某个历史时期“根红苗正”的身份缩写。再后来,随着工业科技时代的到来,“三条石”逐渐衰败,如今依靠留存下来的地名,变成一段悠长的工业历史回忆。

创作《三条石》这样一部工业题材作品,与我人生经历有着紧密联系。1980年我高中毕业,走进一家全国闻名的“大国企”,生活中的骄傲也随之产生:根本上的每月粮食供给,一下子提高到了43斤;加班一次,能有两毛钱的菜品补助。但是“大国企”的金字招牌并没有让我激动多久,很快陷入迷茫状态。艰苦的重体力劳动,让我对“工业、工厂、工人”产生强烈的厌烦情绪。那时候我穷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工厂。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焦虑中,我开始学习写作。那时我怎会知道,四十年后当我开始创作与“三工”相关的《三条石》时,我又是多么感激当年的艰苦劳动,还有那么多的久远经历——少年时代无数次参观“三条石革命

历史博物馆”的遥远随想,与青年时代的工厂经历依然对接,在我将要步入甲子之年的岁月感慨中,《三条石》的创作激情也就不由分说地到来。

我要把我的“工人经历”与天津这座“工业城市”相联系,通过“三条石”这个“思考支点”,去讲述天津乃至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以及国家工业发展历史。在构思这部作品初期,我多次前往故事发生地——三条石大街——去回忆这座城市的工业历史;走访我过去的工厂同事,通过“人和事”去唤醒我“劳其筋骨”的工人经历,特别是微妙复杂的细节。同时我也在认真思考,应该用怎样的体裁、怎样的腔调去讲述这个可能看似有些枯燥的故事。

为此我做了两次试验:一次是“题材试验”。首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名字就叫《三条石》,发表在《中国作家》(2019年7期)。小说发表后,《小说月报·大国版》立刻予以转载。许多相识的朋友问我,为何要写这样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同时还有不少人建议,为什么不写成长篇作品?另一次是“体裁试验”。尽管之前我通过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写过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报告文学的写作经验,绝对不能带到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来。所以在动笔《三条石》之前,我特别认真阅读一些“非虚构”经典作品,有杨·T·格罗斯的《邻人》,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带有自传性质的虚构作品,如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以及带有强烈自我印记的保罗·策兰的诗歌,等等。为了充分掌握“实战”经验,我还“活学活用”,用“非虚构”的写作手法,写了两篇“阅读笔记”小说——《李和卡波特来到耶德瓦布内》和《灰烬上空的亮光》。

即使如此精心准备,在《三条石》写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大麻烦——关于素材的取舍。刚开始动笔的时候,沉浸在激动之中,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面对数百万字的资料,依旧感觉太少了,还在拼命收集。这和我在创作初始定下的基调有关:要站在历史纵深角度,用“文化视角”去看工业发展,不仅要写天津工业、

留住老地名里的乡愁

□黎 科

市历史文脉的断裂与缺失。

讲述城市故事的形式与方法很多,特色老地名是其中一种。城市里的特色老地名不但代表着具体的空间位置,还是城市某一历史事件的浓缩。地名的稳定性能够保存城市的历史记忆,特色老地名所具有的独特性,又是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区别的重要基因。

特色老地名体现了城市的历史风貌和人文变迁的记忆。老地名特别是特色老地名伴随着城市的变迁与进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体现,微缩了城市个性化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不难发现,那些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经过历朝历代的叠加变迁,老地名呈现出分布密集的特征,很多即使在现代都焕发发出极盛的历史人文气息,如广州的甜水巷、天字码头、状元坊、蒙贤路等,无不浓缩了广州一段历史或民俗。研究地名的变迁,能够探究城市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众多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是城市文脉的重要承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人们来说,特色老地名则是一段回忆,更是乡愁。老地名承载了人们关于自身族群发展、关于栖息之所、关于古城记忆的深厚的情感。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而是可能讲述了一个故事,寄托着人们内心的一种期盼。地名既然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和象征,也是一种牵动人们乡土情怀的称谓。

地名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可能是历史事件,也有可能是民俗、语言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地方政策的影响。尤其进入新时代,很多城市大力开展旧城改造,快速城市化加快了地名的演变,很多老地名消失在大拆大建之中。以广州为例,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0年,广州老地名消失数量达1031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快,又有

地名以诗歌而显,诗歌因地名而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唐朝诗人刘禹锡那首著名的《乌衣巷》使得“乌衣巷”这个老地名成为这座城市的代名词,散发着南京历史的沧桑感;“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道尽了姑苏城的温婉婉转;“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浔阳历来是历代文人墨客游历之盛地,亦有“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之美誉……

倾听老地名中的文化回响

翻开文学史,许多诗词大家、文人墨客在他们的诗词歌赋中都提到了各式各样的地名。这些地名不但寄寓着古人的乡愁,更成为现代人宝贵的乡情记忆。老地名,不但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地理信息标志,更是历史与人文的深层记忆。从许多古诗,如《山海经》《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等,可以查阅到许多古地名的记载和研究。

每座城市都有许多的地名,这其中不乏别具特色的老地名。老地名是留在城市里的历史,寄托了人们的乡愁与情怀。城市特色老地名涉及到地方的民俗、语言、地理等众多文化因素,对于追寻、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场合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保护中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地名中暗含着传统文化的元素,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保护地名文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城市地名具有指位功能及文化传承功能,是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结合体,是城市文化积淀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信息,体现着城市的形象与风貌。城市文脉是城市漫长发展过程中凝聚的演进脉络,城市历史文化特征,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形态与定位。然而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在地图上消失的老地名越来越多,很多具有底蕴的特色老地名被各式洋地名所取代,造成了城

面,应谨慎更改或撤销老地名,针对老地名的调整或变更要多渠道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不让有特色的老地名随意消失。新建、扩建的道路、公交站、地铁站、桥梁等,应尽量使用老地名,在新建、改建中将特色老地名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留住城市特有的历史文脉。同时,可考虑重新启用一些已经撤销或更改的特色老地名。

在城市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加强地名文化资源的开发,营造有特色的地名文化环境与氛围,是留住老地名的特有途径。加强地名文化建设,首先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与同心支持。加强社会性合作,广泛动员企事业单位及热心地名文化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地名文化建设和地名保护工作中,形成地名文化保护的社会合力。其次,大力增强宣传的力度与广度。当前,人民群众对地名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开展地名文化的宣传工作,普及地名文化,让社会公众都能认识到保护特色老地名的必要性。除了运用传统的老地名保护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方法,还应当充分应用融媒体技术,开展更多元、更丰富的宣传活动,比如以开设微信公众号、举办网络大讨论等方式进行。2019年,中国首部大型地名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国地名大会》创新了融媒体互动方式,其中联合抖音平台发起的“地名背后是家乡”挑战赛,超过千万人参与,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特色老地名涉及到城市的历史、地理、民俗等多种文化因素,承载着一段段老故事,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其真实性往往难以考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特色老地名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就应该被城市发展的洪流完全冲刷掉。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新时代,从文化的角度去追溯和解析特色老地名的历史由来,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历史底蕴,去思考如何留住特色老地名,才能更好地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讲师,本文为2022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宁波地名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策略研究”[编号2022N94]、2021年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课题“浙江地名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策略研究”[编号MZKT202172]的研究成果)